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文化逻辑

戴国斌¹, 曹可强¹, 郑国华¹, 高晓波², 杨海晨³, 花家涛⁴

(1. 上海体育学院, 上海 200438; 2. 华南理工大学 体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1; 3.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4. 安徽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 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 中国体育以五大文化逻辑——基于去“病夫”的逻辑起点, 在增强人民体质的使命履行中, 形成甩掉“东亚病夫”帽子的现代化; 基于“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理念,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重大政策制定与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中, 形成人民共建共享的现代化; 基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形成的举国体制, 在实现快速赶超发展、提供“中国创造”的实践中, 成就创造竞技体育奇迹的现代化; 基于中国历史与国情, 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友谊与比赛相结合的发展理念与体育文化新形态的中国方案中, 走出“并联式”发展的现代化; 基于文化的民族性, 在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责任担当中, 形成讲述中国故事的现代化——书写了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建设体育强国的文化篇章。

【关键词】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 体育强国; 文化逻辑; 人民为中心; 并联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 G8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3)01-0015-07

DOI: 10.15877/j.cnki.nsic.20221129.001

先在西方出现, 后来成为世界范围普遍现象的现代化, 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求生存、谋发展的目标。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近代“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探索, 以及“救亡与启蒙”“民主与科学”等主题的探讨之后, 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发展目标, 并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出发, 系统阐述为“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走出了立足国情、蕴含中国文化、体现中国特色又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新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文化逻辑: 甩掉“东亚病夫”帽子, 构建人民共建共享群众体育基础, 创造竞技体育奇迹, 探索“并联式”发展道路, 讲述中国故事。

1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是甩掉“东亚病夫”帽子的现代化

诚如习近平“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 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

之言^[1],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 在“国与民一体”的传统思想基础上, 在近代“病夫”概念“由国而民”的演变后, 以增强人民体质的使命担当, 从“全民健身计划”与“奥运争光计划”之路径, 书写了甩掉“东亚病夫”帽子的文化篇章。

1.1 中国体育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与 Sick man(病夫)概念相关

“病夫”概念的引进, 始于1894年12月《万国公报》转载《法国时报》的评论“今东方又有一病夫矣, 日本虽小, 竟将摇动其本根, 摧伤其枝叶”, 以及1895年3月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一文中“盖一国之事, 同于人身……今之中国, 非犹是病夫也耶”的比喻。不论是西之《法国时报》记者还是中之严复, 他们都采用了近代西方国际关系用 Sick man(病夫)指称“长期衰败无力改革的落后国家”的

收稿日期: 2022-11-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ATY005)。

第一作者: 戴国斌(1963—), 男, 江苏宝应人, 博士, 教育学博士后,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武术文化与社会。

论述方式^[2]。但在人们以“病夫”分析中国问题、认识中国国情时,国家贫弱的“病夫”演变为国民体质羸弱的“病夫”。“东亚病夫”也由此成为列强的讥讽语,成为中国社会精英以强国强种疗治中国社会的逻辑起点^[3]。

1.2 “强国强种”话语的传统再造

“病夫”由国而民的解读,看似文化交融中的误读,实际上与时人对中国振拨求强的希望有关,也是时人利用传统思想理解“病夫”概念的结果。正是“国与民”关联性认识的传统,致使时人在国际关系话语国家身体的“病夫”概念中看到了国民身体的“病夫”意象,并在“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强国民之体力,为强国民之基础”^[4]“修己之道……以康强其身第一”^[5]的认识中,形成了近代新民说的强国强种话语与“国民身体改造”运动。

1.3 中国共产党人“增强人民体质”的使命担当

中国真正意义的体育现代化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将现代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新中国体育现代化将去“病夫”的“增强人民体质”为其政治使命,以“全民健身计划”与“奥运争光计划”为路径,既将体育视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也将体育作为新中国突破西方封锁、粉碎国际体育分裂中国阴谋、向国际社会展示新中国发展与中华儿女崭新形象的路径^[6]。

总之,在近代“国民身体国家化”与“国家身体国民化”认识基础上,新中国将体育置于关乎国家前途命运、民族复兴的高度,书写了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甩掉“东亚病夫”帽子、建设体育强国的文化篇章。

2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是构建人民共建共享群众体育的现代化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将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结合,从“一切为了人民”出发,构建群众体育制度建设,完善群众体育锻炼的基础设施。同时,从“一切依靠人民”出发,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在体育用品制造、民间体育赛事的基层民主上进行了可圈可点的实践探索。

2.1 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体育指导思想

在将体育现代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工作指导思想。

早在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提倡国民体育”;1950年7月,《新体育》发刊词提出“把体育普及到千百万劳动人民中去”的目标;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将新中国体育运动视作“管六亿人民的大事”,凝练为“增强人民体质”的政治使命。在“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认识下,既将体育视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也将8月8日作为全民健身日,确立了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地位。

2.2 以人民为中心的重大体育政策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发布、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激发了群众体育锻炼的热情,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奠定了广泛而雄厚的群众基础。

首先,1954年《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1975年《国家体育锻炼标准》、1990年《学校体育工作条例》、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1995—2025年4个《全民健身计划》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相继出台,不仅将满足人民群众增强体质、共享体育发展成果的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将人民性作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本质规定。

其次,在解决群众体育场地难题、抓住体育组织“牛鼻子”、破解科学健身方法的瓶颈性问题中,建立健全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如面对群众“去哪儿健身”的难题,建成县、乡、村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 min健身圈全覆盖,提高人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便捷性,截至2021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41 m²;将群众体育锻炼“与谁一起健身”作为“牛鼻子”,积极发展体育健身组织和健身站点,2020年底,全国共有体育社会组织4.73万个,城市社区全民健身站点平均每万人已达3个,为全民健身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正面群众体育“如何健身”的瓶颈性问题,利用媒体宣传、播放宣传片、开办专栏、设立专家热线,加大科学健身知识与方法的宣传,使“多锻炼,少生病”成为社会共识,

“运动是良医”观念渐被人们所接受。

最后,体育重大政策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激发了人民健身的热情。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持续提高,2007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为28.2%(含在校学生),2014年底提高到33.9%,2020年底增长到37.2%;城乡居民身体素质也随之提高,2010年国民体质监测合格率为88.9%,2014年为89.6%,2020年则达到90.4%。

2.3 人民共建共享体育的文化逻辑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以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探索基层民主的实践经验,体现了人民共建共享体育的文化逻辑。

一方面,在国家“自上而下”推出广播体操、简化太极拳、健身气功等健身文化产品时,人民群众以因地制宜地利用树杆与竹竿制作的爬杆、因陋就简的水泥乒乓球台、废物利用的旧汽车零件改造的“杠铃”等体育器械的新“发明”,以及“百万娘子军”的木兰拳、火热流行的广场舞等“自下而上”健身文化产品的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地散发着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群众智慧,体现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群众力量。另一方面,见证历史、创造历史的人民,也在民间体育赛事的基层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上形成了可圈可点的实践经验。如福州闽侯县龙舟竞渡协会“训练听教练”与“其余会务在会长主导下征求大家意见,出现分歧时会长拍板”的民主集中制;湖南浦市村落龙舟赛“热心人牵头,大家一起来拿主意,决定后通知外地打工人员返村训练,赛事期间妇女做饭,专人收份子钱,专人管账”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贵州台盘村的“村BA”,以其集体讨论的集思广益、“小食一条街,看球、农家乐、民宿一条龙,厕所、更衣室、媒体室配套设施”全员全过程参与的系统运作,将一个源于1936年、自筹举办于1968年、规模发展于2016年的村落体育赛事,在2021年以“美丽乡村”篮球联赛作为贵州全省的IP赛事,实现其由村而县而省的新发展,其赛场边架梯子、站房顶、爬围墙的观赛场面蔚为壮观,网络直播浏览人数超过一亿人次。

总之,人民至上的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既以“举政府之力”制定政策、建设群众体育锻炼基础工程、指导与服务人民群众的体育锻炼,也以“举人民之力”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

神,焕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与历史创造精神,走出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发展新道路。

3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是不断创造竞技体育奇迹的现代化

从“东亚病夫”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从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到世界“第二集团”的领先地位,及至“第一集团”,中国竞技体育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以“为国争光”之担当^[7],在举国体制的有力保障下,用了五十多年的时间在国际体坛走出了后来居上的快速赶超发展之路,创造了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奇迹。

3.1 举国体制的体制保障与体制优势

基于中国数千年大一统历史,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举国体制,成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在人才匮乏、水平低下、场馆凋敝中艰难起步的中国竞技体育,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在1952年备战第十五届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建“中央体训班”后,逐渐建立起一整套有效配置有限资源、创造我国竞技体育快速赶超奇迹的举国体制——组建了从各级少体校到体工队的“组织一条龙”,明确了“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思想一盘棋”,探索出“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确立起“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五个过硬”优秀运动员的培养标准——为短时间改变我国竞技体育面貌,持续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硬实力,促进我国竞技体育进入国际竞技体育的第一集团^[8],提高了制度保障,发挥了体制优势。

3.2 竞技体育的快速赶超发展

与新中国发展同步的中国竞技体育的快速赶超发展,萌发于建国之初、发展于改革开放、形成于新时代。

首先,在新中国翻身做主人的热潮中,竞技体育呈现出旧貌换新颜的发展势头。不仅体现在吴传玉于1953年8月9日获第一届国际青年联欢节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仰泳冠军,陈镜开于1956年6月7日打破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也体现在1955年

公布的102项全国纪录中,有96项都是建国后创造的,至20世纪50年代末已全部刷新了1949年以前的全国纪录;还体现在航空、田径、游泳、举重、射击等18个项目中39人31次打破了世界纪录。为此,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指出:“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9]其次,在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的东风中,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成为中国竞技体育第一个奥运会冠军,这个突破也因1936年柏林奥运会全军覆没的中国代表团在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发表的五环旗下一群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的漫画,而有“零的突破”之称,其时的国外媒体将中国视为“正在觉醒的体育巨人”。最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鼓舞下,我国竞技体育先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金牌榜和奖牌榜上进入“第二集团”,后以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奖牌榜第四、2000年悉尼奥运会奖牌榜第三而进入“第二集团”的领先地位,终于2004年雅典奥运会位列奖牌榜第二而进入“第一集团”,实现了竞技体育强国梦。

3.3 提供“中国创造”的快速赶超发展

如毛泽东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指出的“中国应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国竞技体育的快速赶超发展,既以世界冠军与世界纪录演绎了人类体育的新风采,也以技术创新、优势项目与重大赛事承办,为世界体育提供了种种“中国创造”。

首先,从1956年陈镜开打破第一个世界纪录、1959年容国团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1960年我国登山健儿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1984年许海峰取得第一枚奥运金牌、2002年杨扬冬奥金牌“零”的突破……到2021年,我国运动员斩获3 655个世界冠军数、1 363次创新世界纪录,奏响了我国竞技体育快速赶超发展的“义勇军进行曲”。其次,从汪嘉伟“前飞”“背飞”到邹市明“海盗打法”等运动员的个体创新,从国际体操联合会以中国运动员命名了43个体操动作^[10]到世界乒乓球技术、器械创新最突出的46项成果中中国贡献

了27项占58%^[11]等集体创新,我国竞技体育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既改变了中国竞技体育历史,也书写了更为精彩的世界体育史。最后,中国体育一方面以“夺冠次数最多、世界级明星数量最多、长盛不衰”的中国乒乓球队、“六连冠”的中国女排、勇攀高峰的中国登山队、享有“梦之队”之誉的中国跳水队等优势力量,擦亮了我国竞技体育名片,创造了国际体育奇迹,树立了国际竞技体育的新标杆。另一方面,中国体育还以其制度优势和非凡组织能力在重大赛事的组织上形成了中国影响。如世界首个“双奥之城”北京,不仅在2008年赢得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北京奥运会是所有奥运会中最好的一届奥运会”的评价,更在2022年被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誉为“创造了历史,为奥运留下了一套全新的标准”。

总之,得益于举国体制的中国竞技体育快速赶超发展,既是运动水平不断勇攀高峰的奇迹,也是向世界体育不断提供“中国创造”的奇迹。

4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是探索性地走出“并联式”发展的现代化

正如习近平指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用了200多年先后经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串联式”发展,我国以“并联式”发展开辟了后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12]。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以“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并联式”发展道路、“友谊与比赛相结合”的“并联式”发展理念与体育文化新形态的中国方案,走出了一条“并联式”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4.1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并联式”发展之路

面对既要用体育甩掉“东亚病夫”帽子,也要在世界体坛展示中国形象与中国体育形象的双重压力,不同于西方体育先后“串联式”发展,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走出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并联式”发展之路。

首先,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提倡国民体育”的“普及”;1952年2月18日,中组部、团中央联合颁发通知准备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组建“中央体训班”的“提高”,具有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贵族式体育、于工农大众中普及体育的伟大实践基础。如1940年1月,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13]同年7月,贺龙在《体育训令》中指出:“体育运动应当在全军内广泛开展起来,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同时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经常组织比赛和表演,选拔出优等选手再去指导普及。”^[14]其次,“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两种发展状态及其关系的认识与把握。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1958年1月20日,国家体委《关于1958年体育工作的通知》将“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作为工作目标,形成了在广泛开展群众体育基础上提高运动技术的发展模式^[15]。1959年4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体育工作中,应当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水平。”至此,“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成为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方针^[16]。最后,虽然就该方针服务对象而言,其结合可以被理解为体育的健身性与竞技性、群众体育的普及与竞技体育的提高,以及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都有各自的普及与提高等不同层面的理解。但是,就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视角而言,“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反映了新中国体育工作“两条腿走路”^[17]的原则,体现了我国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不是先后“串联式”发展而是同时“并联式”发展的工作新理念,并作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重要的文化软实力,贯穿于随后“全民健身计划”与“奥运争光计划”两套举国体制工作体系的构建、全运会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同发展的制度创新设计、备战冬奥会与“三亿人上冰雪”的新时代传奇之中。

4.2 “友谊与比赛相结合”的“并联式”发展理念与体育文化新形态的中国方案

面对西方落后挨打的生存法则,认识到中西文化对强弱关系在认识与处理方式上的根本性差异,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在实现自身赶超发展时,还以“友谊与比赛相结合”的“并联式”发展理念及其体育文化新形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弱并存共生关系提供了中国方案。

首先,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思想,是毛泽东1969年5月于武汉调研观看部队战士篮球赛时提出^[18],后在1971年中国乒乓球

队赴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时周恩来的转达中成为中国体育工作方针^[19]。其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仁”“和”观念^[20]、孔子关于西周射礼“君子争之以礼”之概括、中国传统体育“以武会友”目的基础上,不同于西方“一分为二”,从中国文化“一分为三”的传统出发^[21]所形成的关于体育文化形态的新设想:既要比赛,也要友谊;既要实现竞技体育的赶超,也对落后挨打国际社会生存法则提出中国主张。作为人类体育“既比赛也友谊”复杂关系的一种新理解、一种新把握,其背后渗透着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关于强者与弱者并存共生的新构想,现已成为中国体育的集体无意识。最后,在西方以其强者视角,由“各美其美”出发形成人类共同体的“文明冲突观”,并于世界舞台上演绎了“强者优先,强者压迫弱者,落后挨打”的“强者戏剧”后,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是“接着演”西方主导的“强者戏剧”,还是“对着演”对立西方的“弱者戏剧”,抑或“通着演”强弱并存共生的新戏剧?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友谊与比赛相结合”精神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从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友谊与比赛相结合”的体育交往准则、体育文化理想境地出发,世界不仅仅是强者赢得发展、展示强者发展的舞台,还应是强者责任担当、伦理自觉的场所,是强者自觉扶持与帮助弱者、强弱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总之,与西方先后线性“串联式”发展的道路不同,后发的中国现代化注定要协调发展多重需要,也以“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理念探索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体育现代化以及为国争光的竞技体育快速赶超发展之路。与西方的二元对立、分离的认识不同,中国文化“一分为三”的优秀传统,使得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在实现自身赶超发展时还以“友谊与比赛相结合”思想,创造了中国体育奇迹,为世界体育文化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

5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是讲述中国故事的现代化

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中国体育,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以中华体育精神之主题、“继承与创新,学习与赶超”之精神,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中国故事。

5.1 以中华体育精神讲述中国故事

始于20世纪60年代容国团“人生能有几回搏”

呐喊、继之于20世纪80年代“五连冠”女排精神、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华体育精神,在激励体育健儿勇攀高峰时,还讲述了中国式体育现代化鼓舞民气、展现中国力量的中国故事。

首先,建国初期竞技体育顽强拼搏的精神,容国团在1961年以“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感悟于全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其话语背后的体育精神,不仅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还作为广大青年的座右铭,穿越时空成为无数中国人攻坚克难、开辟各自人生新天地的精神助力剂。其次,中国女排在1981—1986年间的五连冠战绩,其“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女排精神”,既体现了80年代中国社会的奋斗激情,也成为几代中国人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精神动力。最后,在1996年《中国体育报》推出“论中华体育精神”主题的系列报道形成4种不同的表述之后,国家体委以5次党组讨论最终确认其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22]。中华体育精神不仅表现了中华儿女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豪气,而且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了坚定信心、鼓舞勇气、增强凝聚力的重要作用。

5.2 讲述“继承与创新,学习与赶超”的中国故事

在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中发展的中国体育,既以运动水平展示了“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新中国形象^[23],以赛事组织呈现了“热情、开放、文明”的改革开放形象^[24],也以中国式体育现代化道路讲述了“不忘本来的继承与创新”“吸收外来的学习与赶超”的中国故事,展示了“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

一方面,面对如何对待现代体育与传统体育的复杂性问题,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在建立健全现代体育专业学科系统时,还以由武术课、武术班到武术系,由本科、硕士到博士培养的新发展^[25],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登台亮相,探索出现代体育与传统体育协调发展的“并联式”发展路径,并与武术的挖掘整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起,诠释了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不忘本来的继承与创新”的中国故事。另一方面,面对西方落后挨打的生存法则,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先以“友谊与比赛相结合”思想,后以与世界分享中国乒乓球发展成果、促进世界

乒乓球运动均衡发展的“养狼计划”,表达了文明大国、东方大国的体育理想主张,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责任与担当,阐释了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吸收外来的学习与赶超”的中国故事。

总之,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既以体育文化的精神作用服务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为后发国家坚持现代体育与传统体育协调发展、实现学习与赶超发展、促进世界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路径选择,讲述了精彩的中国故事。

6 结语

习近平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26]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以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在甩掉“东亚病夫”帽子的文化篇章中,以人民共建共享体育为基础,既创造了竞技体育发展奇迹,也探索出适合中国的“并联式”发展道路,还讲述了中国故事。

新时代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新的“赶考路”,需将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进行到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续写“人民体育主旋律、竞技体育奇迹、‘并联式’发展道路”的新文章,在讲好中国故事基础上做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新贡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 杨瑞松.想象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J].(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5(23): 11-13.
- [3] 戴国斌.中国武术的文化生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4] 奋翻生.中国近代体育文选[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
- [5] 蔡元培.中国近代体育文选[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
- [6] 刘鹏.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新中国体育60年[J].求是,2009(16): 25-27.
- [7] 熊晓正,郑国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形成、演变与重构[J].体育科学,2007(10): 3-17.
- [8] 田麦久.国际竞技体育格局的“雅典重组”与中国竞技体育的科学发展[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2): 1-16.
- [9]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0] 中国体操协会.以中国运动员名字命名的40个体操动作 李宁最多[EB/OL].(2019-06-05). https://gymnastics.sport.org.cn/cga/international_gymnastics/2019-06-05/540549.html.
- [11] 国家体育总局研究课题组.星光如何这般灿烂?——为中国乒乓球队成立50周年而作[J].求是,2002(14): 55-58.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4] 谢武申,王鼎华.共和国体育元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 [15] 卢文云,唐炎,熊晓正.建国初期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历史回眸[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7(4): 9-12.
- [16] 谭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方针的由来与发展[J].体育文史,1992(1): 2-7.
- [17] 毛泽东.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18] 胡国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由来[J].党史博览,1994(1): 49.
- [19] 曹守詠.关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历史研究[J].体育文史,1992(1): 2-6.
- [20] 卢元镇.建议重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J].体育文化导刊,2009(4): 1.
- [21] 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
- [22] 黄莉.中华体育精神的文化内涵与思想来源[J].中国体育科技,2007,43(5): 4-5.
- [23] 顾燕.《人民画报》(1950-1966)中的体育摄影图片对中国形象建构的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20.
- [24] 李德芳.体育外交的作用及其运用——以北京奥运会为例[J].现代国际关系,2008(10): 55-60.
- [25] 邱丕相,杨建营,王震.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回顾与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44(1): 12-20.
- [26]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作者贡献声明:

戴国斌: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撰写、修改、校对论文;曹可强,郑国华,高晓波,杨海晨,花家涛:讨论论文框架、提供相关调研材料与相关文献、校对论文。

Cultural Logic of 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DAI Guobin¹, CAO Keqiang¹, ZHENG Guohua¹, GAO Xiaobo², YANG Haichen³, HUA Jiatao⁴

(1.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3.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4.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hinese sports has written a cultural chapter in achieving 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and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by following the Chinese path and five branches of cultural logic. These branches of cultural logic include: based on the starting logic of getting rid of the label of the ‘sick man’ and fulfilling the mission of enhancing the physical fitness of the people, Chinese sports would dedicate to the modernization that shakes off the label of ‘sick man of East Asia’;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doing everything for the people while relying on the people in everything they do, and following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to developing major policies and building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Chinese sports would shape the sports modernization that features joint building and sharing; based on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which had been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great practice of Chines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hinese sports would work on the modernization that creates competitive sport wonders in achieving rapid catch-up development and providing ‘Chinese creation’; based on China’s history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as well as the Chinese path that features the combination of popularization with improvement, the integration of friendship with competition and a new form of sports culture, Chinese sports would see paralle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cultur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fighting for national glory, Chinese sports would achiev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own narrative.

Key words: 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cultural logic;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parallel development